

陈君葆全集

陈君葆 著 刘秀莲 谢荣滚 主编

文集

下册

舊船木致吾新詞賜春形容入時宜是赤絲從緊定三年無改復重聽
舊船木致吾新詞賜春形容入時宜是赤絲從緊定三年無改復重聽

主人魁飛揚杜撰　畫道仙家總不如鶯鶯綉罷更長袖畫眉深淺尋常事莫忘明
歌亦新穎可喜也

朝是歲除　舞翻孤步舊歡娛手作羹湯自入厨想見醉杯周歲候餘痕鋒

瑣詰艱虞　照花曉鏡影娟娟即是南強女北妍君長於至州女先生於美園寧似王陵王大婦

荀輿夫婿別經年　卿卿解喚覺矜持小小能詩墨異時別有壺中閑

歲月雲烟歸去憶阿誰　細讀朱陳嫁娶圖升堂笑我後諸儒只應湯

餅仍為客啼試徐卿第一霏　除夕前一日酒晏先生以宣講相招課松祥先生歸之二周年紀念日急物無

以為禮回歸賦六章贈當補賀六年即生
松祥堂長　荷華女史啞正

〔香山文库〕

陈君葆全集

文集

下册

陈君葆
刘秀莲 谢荣滚 主编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君葆全集·文集 / 陈君葆著, 刘秀莲, 谢荣滚主编.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218-13290-7

I. ①陈… II. ①陈… ②刘… ③谢… III. ①陈君葆 (1898—1982) —全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87463 号

CHEN JUNBAO QUANJI · WENJI

陈君葆全集·文集

陈君葆 著 刘秀莲 谢荣滚 主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肖风华

出版统筹: 柏 峰 张贤明

责任编辑: 张贤明 李沙沙 周惊涛 陈其伟 刘露露

装帧设计: 彭 力

责任技编: 周 杰 易志华 吴彦斌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广州市浩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60.25 插 页: 9 字 数: 710 千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0 元 (上下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丁篇

谈艺论学

汉译《伊斯兰真义》序

去岁秋，余友苏菲加芙尔君示余以古蓝亚马特所著《伊斯兰真义》（*The Teachings of Islam*）一书。余读而善之，曰：“回教入中国千余年，于兹矣然。方穆罕默德之兴也，固尝借兵力以推行其教义，故不三十年，遂奄有西亚波斯以与我葱岭以西诸地相接壤，余威所被且于后此百年间囊括北非，席卷西班牙，几撼东罗马帝国而摧陷之，其功业可谓盛矣！乃其教一入中土，即改易趣尚，不复以耀武扬威为事，何哉？岂以震旦文治之涵濡，足以去其凌厉耶。然余稽诸穆教经典神圣战争之为义，各宗所训不无异同，逮十九世纪末古蓝亚马特出倡阿密地耶宗于印度之般遮比省，所纂教义独与他宗异，盖主张对异教持一种宽大主义者也。其训神圣战争，则谓为神灵生活，对恶生活与非正义之决斗，对异教或不信教义者则怀柔之，以和平方法而不主用兵。是知余绪流风有历千百年而犹不足以尽其美者，非粗藏之深、植基之厚，曷克臻此。今诵古蓝氏之书，想见其为人宽柔诚朴极似耶稣，其以救世主自称，良非过侈也。夫清真之为教，奉一神而行简易，尚虔敬而轻祭祀，无种族之界限，无阶级之歧视，信仰既一，如同兄弟，其切于民生日用若是。故虽崛起一隅而信奉之者遍于寰宇，此岂偶然也哉？抑阿刺伯自古即为游牧民族散居之地，其族生活无定，往来飘忽，虽时自此侵入他邦，启图沃宇，蔚为大

国。然在阿刺伯，则有史以来实未尝成为一政治单位，穆罕默德兴，乃揭教义，借兵力以统一全岛，更挟其余威乘破竹之势，以从事于以《可兰经》征服全世界之举，此其计划不可谓不宏伟！且揆以当时之情势，又不可谓为无成功之可能也。故史家威尔斯氏曰：“假使回教徒中有数十青年具阿布伯克之性质者，其事业必有成功之一日。”所谓已近成功之境者，因阿刺伯此时已为回教信仰及意志之中心，且因当时世界除中国外，且除在俄罗斯草原或土耳其斯坦诸地中，已再无精神自由之人民。能团结为一而深信首领者。夫以散漫之游牧民族，一旦乃借宗教力量，混为一体，团结以向外，此宁非历史一异迹欤。余因之而重有感焉，古蓝氏余不得而见之矣，得读其书，揣摩于其所以立教之由，从而寻译天经之真义，则古所谓宽柔以教者，其不在兹乎，其不在兹乎？加芙尔君曰：“子既善之，盍遥译为中土文字，以广布其义。”余曰：“诺。”乃以授课之余，闲日翻译数页，计历时凡数月始蒇事，中间又得黄国芳、程挚二君相助为理，乃底于成。感幸之余，为识其事之原委如此。

中山陈君葆识于香港大学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春三月

(一九三六年)

口号与民族革命战争的文学

无意中翻到了一篇鲁迅先生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发表的文章，题目叫做《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在那篇文章，他开宗明义地说：“左翼作家联盟五六年来领导和战斗过来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运动。这文学和运动，一直发展着；到现在更具体地，更实际斗争底地发展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跟着他指出了，这“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新口号的提出，并不能看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停止，或者说这路走不通。它不是停止了历来反法西斯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并不是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底领导底责任，而是将他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展。他说这话时，是五年前的事了。那是在文学界的统一阵线喊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之后，我们应该还没有忘掉。

为着提口号的问题，当时还引起过一段很剧烈的论争。这大概因为在他那篇文章里边，鲁迅先生有过下面的几句话的缘故。他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在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艺’等等，我以为是无碍的。不但没有碍，并且是有益的，需要的。质难的人并且用到‘标新立异’这样的字眼来指摘。”其实，他的所以要提出一个新口号，为的只是在推动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们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

战争的前线上去；为的是在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这，在别一个地方，他是曾经很明白地指出过来的。他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名词，在本身上，比‘国防文学’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在抗战已经进入了第五年的今日，我们感觉到他这话是具有伟大的见地的，正如历史上其他的先觉者一样，他是比较常人更能，并且更大胆地抓着现实。

那一回以口号的问题为焦点的文学论争，在现在事过境迁之后看起来，虽然觉得当局的人未免浪费笔墨一点。然而从另一方面着想，却是富有意义的。即以鲁迅先生那篇《病中答访问者》很简短的文章而论，那涉及的问题便很多了。而这些所涉及的问题，在现阶段的文学，似乎都有“重话旧桑麻”的必要。

严格地讲，文学要在抓到了现实才能够有真实的广大的内容。失却了现实，则口号仍只是口号而已。我们不能够否认口号是有它的用处，有它的力量的，但是单是口号是不行的。鲁迅先生不是说过了吗？提口号，发空论，都十分容易办。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批评上的应用，在作品上的实现。他指出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不应当狭窄，应当十分广泛，“广泛到包括描写现在中国各种生活斗争的有意识的一切文学”。作家如果领会到这一点，他是可以自由地去写工人、农民、学生、强盗、娼妓、穷人、阔佬，甚么材料都可以，写出来都可以成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无需在作品的后面有意地插条民族革命战争的尾巴，翘起来当作旗子，因为正如不在口号主义的样，文学的生命不寄托在尾巴主义之上的。

为鲁迅先生的周年祭作，九一八

（原载《时代文学》第一卷五六期合刊，一九四〇年九月十八日）

有关中国文化与新文字演词

三个月前，记得那天仿佛是美国的国庆日——香港远东情报局要我作播音演讲。我选的题目是拉丁化新文字。今天是我们中国的国庆日，我应了他们的邀请作第二次演讲。选的题目又是拉丁化问题。这一点说起来也有趣。

今天国庆日，照例应该讲些什么双十节感想一类的话，像这讲题似乎不大应景。然而在这“普天同庆”的情绪当中，我并不是没有如我们许多同胞共通的感想。例如对于中国宪政问题的感想。民国建立已经是廿九年了，但是我们的民族仍然在那里争（手旁）扎。仍然在那里极力求翻身来。在这种情形之下，究竟什么时候才使人民得到参政？我们的政府又何时才能够“还政于民”呢？这真是“望得人眼欲穿，想得人心愈窄”的事！然而对于这种问题，凡是国民分子都刻刻关心的问题，我倒感觉到“徒思无益”。反正在目前国内许多地方都因为“战事影响，交通不便”，国民大会实在不容易召集，这也难怪。便是国民大会召集了，又如何呢，全国人民的百分之八十是不认得字的，这民意你怎样去体会出来？又怎样真正地去代表？所以纵然使政府“还政于民”了，试问他们又如何去运用所得到的参政权呢？所以脚踏实地的人们就每每间这样想：以其多作空想，倒不如在劳苦大众的身上做点实际工作，比较有用，比较基本。因此我今天

又再来谈谈拉丁化的问题。

文化与文化的关系

我这一次只摘出两点来讲。

第一，反对中国字拉丁化的最强有力，而又是最耸人听闻的理由，是说中国的文化是和中国的原有文字有着很密切至不可分离的关系的。若是离开了中国文字，那就无从理解中国文化了，尤其是“中国古代的文化，必须用汉字作工具去理解才容易领受”，骤看之，似乎很对，但仔细分析起来仍不免是带感情的话。我们应该承认一国的文化，一部分，而在中国也许是大部分——是寄在那国的文字身上的；但只是部分而不是全部分。因此我们也得承认要理解一国的文化，自然也以了解那国的文字为一种主要的途径。但也只是途径而已，而不是唯一的途径。这为什么呢？因为文化不是单纯地只寄在文字身上，它同时也寄在语言，在宗教，在伦理，在衣服器具，在生活习惯，在建筑，在艺术，在音乐及其他。所以纵然离开了文字，从这各种途径也一样地可以理解，可以领略一国的文化。许多不晓中国文字的外国人，仍然能够十分理解中国文化、中国历史，而且也有些外国学者作家更进而翻译中国的文学作品。同样地，又有许多不认识中国本土文字的华侨，对于中国固有的文化仍能够有很深刻的观点，他们并没有因为不认识中国字而忘记了自己是黄帝的子孙，也没有因为自己所晓的只是外国文字，而对于婚姻丧祭的事情，完全抛弃中国的礼俗。很显明地民族意识是与民族本位的文化有密切的关系的，而这关系也许会因文字的特性而更能团结。但这并不是说，除了文字以外便没有别的因素的，譬如在“小国寡民”的

理想社会当中，文字的作用便减少到很低的限度了。反之，交通工具发展到很高点的国家，假使我们能想像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着一具无线电收音机，并且每家都装置着电话的时候，那文字的作用也一样地减少了许多，虽然不至于完全废弃。

在往昔，文字是常带点神秘性的，但是时代愈近，人民接触的机会愈多，这神秘性也就逐渐消失了。无论如何，在近代人的眼光中，文字只是一种工具而已。

新文字将促进文化

第二，反对拉丁化者又说：“人家正在企图毁灭我民族历史的时候，我们以废除固有文化来号召，更非其时。”既然说是“非其时”，那末，用推理我们当然可以说，若果在不同的情境之下，便是现在的反对拉丁化者也会主张废除固有文字了。本来对于这问题，早就有好几种不同的看法。从纯理来讲，文字向着拼音方面发展，是合理的途径。留恋着方块汉字，只是感情作用，但在目前拉丁化者并没有主张一定要废除汉字。反之他们倒主张文化与汉字相辅并行。但是撇开这点暂且不谈，我们还要问这方块的固有文字，是真的够得上做保种卫国的利器吗？是真的具有那样的力量吗？我希望拥护汉字的人们，千万要认清事实，假使这一层能够证明，当然我们也就无话可说。不过历史的事实是，方块字一样地存在，而中国的历史却演成了好几次的被外族征服，好几次外族入主。虽然每次结果我们都能够把异族同化，自己翻身起来，但是把这功劳全归到方块字的身上，似乎是只知其一而未知其二哩。因为与其说这是方块字的力量，毋宁说是中国文化的力量，中国字对于这力量固然有它的贡献，但无论

如何只是一部分而已。这是应该认清的第一点。其次，一向在历史和中国接触的异族（连有文字的满洲在内），他们的文化都比我们低，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较优的文化来同化他们。假使我们所遇到的民族，他们的文化比我们高，或是和我们的文化不相上下，那末我们历史上的遭遇也许就没有那样的侥幸了。还有，像满洲入主中国，当时就极力“严满汉之防”，假使他们能够维持那种防闲的方法到底，始终能够维持那统治者对被征服民族的地位。而同时又假使他们当中能够产生一种较优势的文字出来，那末凭着政治的势力，则“汉之为汉，未可知也”。我不是说我们不要爱护我们的文字、我们的历史，但是我们不可过分地相信我们固有文字本身的力量。

我们认为中国字拉丁化不但不会妨碍中国固有文化，而且相反地，它还可以更有效地推广固有的文化。同是英文，英国人用来宣传的是英国的文化，美国人用来宣传的是美国的文化；固然，他们两个民族不但同文而且同种。有许多不认得中国字的华侨是通过一种外国文字来认识中国文化的，这也是目前中国字拉丁化运动在三藩市和美国其他好几个地方所以蓬蓬勃勃的一个重要理由。同时我们又得到消息说蒙藏学校的学生也在那里推行蒙藏拉化运动了，这事关系中国文化的前途很大。所以改中国字为拼音制不但不妨碍中国文化，而是相反地可以加速和普遍中国文化之传布。

汉字弱点困难学习

难读，难写，难于记忆，这是我们为中国百分之八十人民设想不能不抛弃汉字的理由。陈鹤琴先生说“要学习到能读、能写

作（指汉字），至少要学习五六年，要读一张普通的报纸全少要记忆一千到四千的单字”。汉字之难大概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了。然而反对拉丁化的人们，仍然有坚不承认汉字难学的，他们说：“假使这些不识字的人们是入了学而字还不识，或者因为汉字难识……那末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可是多数人不识字是因为不得入学，所以不得入学，是因为没有普设学校。试问学校不普及即使拉丁化了，人民还不是不得入学吗？”这话似是而是非，因为我们可以问：“那末，为什么学校不能普设呢？”中国用方块的汉字来推行平民教育，并不是不曾有过的事情。但是成果怎样呢？办过平民教育的都能够知道困难之所在，这是摆在前面的事实。反之外国的传教士到中国来，曾经用过罗马字来写出方言的《圣经》，曾收到很好的结果，“不但《圣经》的销路广起来，就是罗马字本身也流行一时，成为一般不识字的民众用作通讯记流水账的普通记号”。这也是不可抹煞的。总之，若果不是汉字难学，为什么我们这个最看重读书人的民族到现在仍不能够个个都认得字呢？有了几千年文化的民族而识字的只占百分之二十，经济落后自然也是个大原因。但汉字本身之难识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二百四十个部首容易呢？这是廿八个字母容易呢？

（原载槟城《星槟日报》，一九四〇年）

水云楼随笔

“吃饱了整天闲着，一点子事也不关心，这可不得了啊！”

这是那“栖栖一代中”的孔夫子所说的。

他老人家还说：“与其这样，倒不如下下棋或是打几圈麻将还比较好些呢。”

这听起来好像是圣人在提倡或者在默许赌博也似的。其实，如何去消遣空闲，正和如何去花用多余的金钱一样，并不见得是件容易的事，而且那里边还含有不少危险的成分。所以怪不得他老人家担心，而且还想到那“退而思其次”的消极办法。无论如何，我不能够想象他老人家也是喜欢玩几圈的，正如我相信他有时是漫喜欢喝三两杯的一样。

闲着便会发愁，便会感觉无聊，感觉得没有生趣，这是危险之所在。因此我们有“消磨时间”这句话。为应付这问题，去拾贝壳啦，搜集旧邮票啦，收古董字画啦，砌砖墙啦，盖凡尔赛的王宫啦，这和其他的许许多多……连看男人或女人都在内，只要不是“无所用心”的，都不失为方法的一种。记得有一位朋友，据说是爱抽大烟的。每天晚上从十一点起，他便横床直竹地，由他的姬妾轮流伺候着，开始他的吐雾吞云的工作了，一直到三点多四点。这时候，他烟也抽够了，便慢慢地把卧室里的夹万打开，从那里依次一个一个地把大大小小的金表、银表和其他

形形色色的表检出来，欣赏了一回，有时抹抹油，然后开足法条，又摩挲了好一会，才又一个一个把它们放回去，再把洋夹万关上。这么一来，天也亮了，他才去睡。这似乎有点……可是他倒成了一个研究各国名厂时表的专家。

无疑的，喝酒也是排除无聊的一种方法。那回到家里去种田的陶渊明，终于做到“聊复得此生”，我想得力于“杯中物”很不少；要不然，也许他不会吟出“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诗句来。并且，“公田悉令吏种秫”，你能说他不是真爱酒吗？

是哲学家罗素这样说：“一个对于某一种嗜欲放纵自己到把其他一切欲望都牺牲掉的人，在他的心里常深深地蕴藏着烦恼，那是他整天在想着怎样可以摆脱的鬼怪。那狂饮烂醉的，很显而易见，为的是要忘记了一切。如果不是因为有那鬼怪，他们是不会感到醉后比醒时更为适意的。”

罗素的意思，以为所有过量的东西都是偏颇的，纵欲者所追求的不是东西的本身，而是那使他能忘记眼前一切的境界。他是要到醉乡里面去躲避恶魔。

“沉迷酒色”，这多少总是句贬词，因此觉得有点不应该，如果应用来品评人物的话。说得较堂皇冠冕一点，“醇酒美人”，但这也不就是颓废主义。无论如何，目的总不外在逃避现实。

固然，歌颂大自然的陶渊明倒不一定要到醉乡里去才能逃避现实的。在他，“悠然见南山”也就足够了，虽然韩昌黎倒有点不肯这样相信。

* * * *

回到大自然去，如果可能的话；否则回到往昔去。正如大自然一样，回忆也每每给痛苦的灵魂以不少像母亲的爱的慰安的。

* * * *

在《竹素堂全集》序里，陈眉公这样写道：

往陆文定公尝谓余曰：细阅后生真有道，欲谈前事已无人，此东坡赠文潞公诗也。若必欲寻往人谈往事，彼此俱作无口瓠耳。余曰：然则晚年何以为乐。公曰：危坐焚香，手不释卷，诵读融液，流而为诗若文，此亦晚年最乐之真境也……

纵然找到往人谈往事，结果彼此都不过是个无口瓠，这诚然像陆文定公所说，而且又何只如此呢？可是东坡的意，陆文定公的话似仍不足以尽之。固然，“发明东坡之意，以馈学者”，放翁已“谢不能”，何况更在数百年后？诗人的意思，每每为文字所限制，这在中土的文字尤其甚。

在《沙漏》里，梅德林有一段文字，我以为不妨拿来作东坡那句诗的注脚：

我们总没有想到一个和自己仅有一面之缘的朋友死去了，却会留下一个无可填补的陷洞的。

我们常抱恨，对于我们所爱慕的人们，不曾知道更多一点。好像他们只有在已作了古的当儿，才真正地表现出来。但是，如果他们一旦回转来的话，则死亡所赋予他们的一切便立刻消失了。

和那仍活着的不同，已死去了的人保持着我们的爱心一直到我们自己也没有了的时候。

可是仍然得问：为什么我们不对待那仍在生活着的人们跟那已经死去了的一样？不可能么？

（原载香港《华侨日报》，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八日）